

从媒介到城市媒介：对象化、调解性、动向性

吴晓虹 曾庆香

摘要：传统的媒介研究路径依循着媒介作为信道的基本认知。这一基于物质技术和渠道的话语实践虽然符合从印刷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迭变进程，但由大众传播定形的媒介意涵和数位传播主导的媒介实践却形成了一个关于媒介概念的封闭域，从而将媒介概念的缘起悬置起来，同时也将其他实存排除在媒介概念体系外。因而需要在“信道”基础上，拓宽媒介概念的理解边际，以此来完整理解媒介内涵。本文从概念起源中的媒介内涵、中介视角下的媒介内涵、交往关系中的媒介内涵三条路径依次展开，并借助城市这一媒介展开对媒介内涵的具体诠释，以获得关于媒介内涵的完整理解。

关键词：媒介，对象化，调解性，动向性，城市媒介

From Media to Urban Media: Objectification, Mediation, Motor Intentionality

Wu Xiaohong Zeng Qingxia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dia researches followed the basic cognition of media as a channel. Based on material technology and channels, these discourse practices are in line with the process of changes from the printing age to the digital age, however, the media connot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media practices dominated by digital communication formed a closed domain of the concept of media. Consequently, the origin of the media concept has been suspended, and other existence has also been excluded from the media concept

system. This paper aims at broadening the margin of the media concept on the basis of “channel”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media, and tries to explain media connotation from three paths—the orig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ediary, and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and specifically interprets media connotation with urban to obtain the whole understanding of media.

Keywords: media; objectification; mediation; motor intentionality; urban media

DOI: 10.13760/b.cnki.sam.202101021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中提到了对于媒介（medium）的三层理解：（1）“中介机构”或“中间物”；（2）专指技术层面，例如将声音、视觉、印刷视为不同的媒介；（3）专指资本主义。（2005，pp. 299 - 300）实际上，在媒介概念的发展脉络中，这三种理解媒介的方式依序出现。然而，如今人们使用“媒介”一词更多的是表述第二层意涵；同时，由媒介技术层面引申出的另一媒介含义被广泛使用。有学者分析了三种顶级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对于“媒介是什么”的回答，结果显示，“信道”这一界定最获认可。媒介作为信道的技术思想源于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对于媒介的阐释，即信道是用来将信号从发射机传输到接收机的媒介。毫无疑问，信道是对媒介的基本理解，信道承载着信息，并在信息流过程中使双方发生联系。然而，深入理解媒介与社会关系又必然要在信道基础上对媒介做进一步的理解。因为媒介在使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的同时，其自身也与社会产生互动关系；同时，媒介自身蕴含着不同的意向性和逻辑（周翔，李镓，2017，pp. 137 - 154）。由此，建立在信道基础上更广义的媒介理解显得尤为必然。

雷蒙德·威廉斯进一步阐释媒介的“中间物”意涵：一种感官（或一种思想）要去体验（或表现）必须有一个中间物，而在大部分的现代科学与哲学里，媒介的“中间物”意涵被弃用。虽然将媒介作为物质技术和渠道的话语实践符合从印刷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迭变进程，但是这也把媒介概念的缘起悬置起来，同时又将其他实存排除在媒介概念体系外；由大众传播定型的媒介意涵和数位传播主导的媒介实践形成了一个关于媒介概念的封闭域。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则积极扩展了媒介概念的范围，他认为除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常规媒体，媒介还囊括了货币、住宅、道路、数字、时钟和服饰。麦克卢汉的后继学者深化了媒介研究领域，约书亚·梅罗维茨

□ 符号与传媒 (22)

(Joshua Meyrowitz) 打破了传统电视研究集中于探讨媒介内容对特定群体的影响的惯例, 转而研究不同媒介给社会观念带来的变化; 同时, 也突破了传统媒介研究将新的媒介视为原有环境之间的新联系的局限。数字革命带来了学界关于媒介的新认知,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Fredirch Kittler) 曾指出, 以前不同的媒体, 电视、广播、电话和邮件, 收敛成为标准化传输频率和格式。然而, 媒介研究领域的深化只是承袭了麦克卢汉的研究路径, 并未像麦克卢汉一样打破媒介概念的阈限。

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曾分析指出货币扮演了一种独断的媒介, 让世界千差万别的万事万物都能够在价格上等同, 以用来交换与消费。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 认为建筑是人类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媒介, 物质化或者是建立纪念性建筑物, 多少是要使事物形成群体, 形成某个地点, 使其得以延续。德布雷甚至强调在象征物的发展历程中, 起始点是史前巨石建筑群而不是书写符号。(2013, p. 27) 实际上, 货币、数字、建筑等媒介形式已经难以通过媒介技术层面来把握, 因而需要在“信道”基础上拓宽媒介概念的理解边际, 以此来完整理解媒介内涵。下面有关媒介的论述将从三个路径依次展开。

一、概念起源中的媒介内涵: 对象化

从概念的历史梳理和语义分析入手是促使人们严谨、认真运用概念的重要途径。概念的迁衍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 也是变化发展的推动因素。因而媒介概念缘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可以更精确地定义媒介, 媒介的本质属性也可以从中得到把握。

Guillory 考察媒介概念的起源时指出, 媒介最早产生于艺术范畴。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最早提出艺术是人类的模仿活动, 而媒介是模仿的一个面向, 即媒介是模仿中所用的不同形式和质料。具体而言, 颜色和形状构成了绘画, 和声与音律构成了音乐, 故事和音韵构成了诗歌。随着时间推移, 培根 (Bacon) 等人提出了媒介是表达艺术的工具, 后来的洛克 (Locke) 也继承媒介是表达的工具与手段这一观点, 并指出语言是思想的媒介。(2010, p. 322) 当印刷术这一媒介将人类的思想呈现规模外化时, 威金斯 (Wilkins) 和坎贝尔 (Campbell) 等学者也充分注意到了媒介的主体性地位, 对此二人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阐释立场。威金斯采用技术的观点将物质介质本身与消息内容分隔开来讨论, 如今关于媒介的“信道观”正是肇始于此。坎贝尔则落

脚到人们何以感知到媒介的问题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媒介透明度的问题。坎贝尔指出，当人们能够感知到说话者的观念和情感时，我们所假以的媒介（语言）就是完全透明的；而一旦对象表示不完整或者我们知道信息被错误表示，我们的注意力将立即从对象转移到媒介上，此时媒介的主体性地位就显现出来。依照坎贝尔的观点，媒介透明与否，实质是媒介能否将人的思想、观念表述出来或将其对象化。事实上，媒介的对象化过程可以作为“信道”的观念加以理解，在传播活动中，信道承载着经过编码的人的思想与观念。同理，货币可以将人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对象化，建筑则能表述出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和文明观念。这种理解既承认媒介作为信道的论断，即承载了抽象的信息，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抽离出媒介的普遍本质——对象化。然而，这尚不足以诠释媒介的所有内涵。

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人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在它们假以介质表示或者对象化时，它们就不会被搁置。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媒介的理解澄清了媒介的对象化和再现的性质，然而并没有呈现出媒介将事物对象化之后的动向性。

二、中介视角下的媒介内涵：调解性

雷蒙德·威廉斯阐述媒介源自拉丁文，意指中间，这其中就蕴含了中介的思想。德布雷在进一步阐释什么是中介时指出：通过中间媒体，一个被称为作家的个体才能将其头脑中非物质的东西变成可移动、可转让，且在你手中可触摸的物体。基于此可知，理解中介思想是把握媒介概念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实际上德布雷已经给出了明晰的“中介”概念范畴，中介可以指：（1）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清晰连贯的话语、书写符号、类似的图像等）；（2）社会交流规范（说话者或者作家使用的语言）；（3）记录和储存的物理载体（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卷、光盘）；（4）同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手抄本、影印本、数字版）。（2013，pp. 37 - 38）然而，这些具体示例没有呈现出中介的同一性，即缺乏一个本质属性来统摄中介的上述四个方面。有关对中介的认识，黑格尔（Hegel）以思辨的方式在哲学范畴中进行了精妙的论述。

黑格尔认为人要认识真理需要经过许多必不可少的联系环节，而建立这种联系环节的就是中介。中介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标示不同范畴间联系的间接

□ 符号与传媒 (22)

性，范畴中一方的本性要通过与其相对的另一方间接反映出来。简单的例证就是当人对“黑色”这一概念一无所知时，可以假借“白色”概念来理解它，此时“白色”就可以视为中介。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就曾论述中介：举凡两个相异的规定或范畴的统一，并不仅是纯粹直接的或漫无规定的空洞的统一；反之，必须认定其中的一个规定只有通过另一个规定为中介才会有真理——或者说，每一个规定只有通过另一个规定的中介才得以与真理相结合。（1996，p. 163）黑格尔在哲学上对中介概念的探讨是在辩证法和真理认识的范围内进行的。

延续黑格尔的论证，人们的类比逻辑其实也是中介思想的延伸；认识和把握真理是一个曲折进展的中介过程，人们借由熟悉事物的类比来认识新的知识边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体现了古人借流水的物理实体去把握抽象的时间概念，其中水就是人们理解时间的中介。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指出以物体和物质来理解我们的经验，使得我们可以挑选出部分经验，并把它们当成一个统一种类中的离散实体或者物质（Lakoff & Johnson, 2015, p. 23）。一旦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验看成实体，我们就能指称它们，将其归类、分组以及量化，从而通过此途径来进行推理。因此当人利用类比逻辑从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进发的时候，人的已知领域就呈现出中介性，但已知领域不是简单的介于人的认识和未知领域的中间物。中介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解未知领域和人的认识，进而使两者建立起通畅的联系。王鹏令总括黑格尔的中介概念时称中介是不同范畴之居间联系的环节，由此引申出中介的一个特殊表现——作为居间调解的环节（1981，pp. 151 - 152）。雷蒙德·威廉斯对“调解”（mediation）一词的注解之一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或是作为中介的媒介，而追溯调解最初的拉丁文释义，可知调解意为分开两半、占据中间位置、作为一个中介。

在明晰中介是调解两个主体的关系并使其建立共通联系后，可以返回来把握媒介的性质。现今学界对媒介化的探讨的底层逻辑就是媒介具有中介的基本性质，不同形态的媒介以自身的逻辑调解社会中存在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不一样的联系。伊尼斯（Innis）在探究传播工具与文明间的关系时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2003，p. XI）。事实上偏向空间的媒介和偏向时间的媒介之所以造成不同制度和文明，就在于两种不同媒介调解关系的方式不同，以及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和联系的方式。表意、象形和字母书写系统在修辞、逻辑和语法方面各不相同，这也导致了不同文明发展的不同轨迹。腓尼基字母书写系统的独特性奠定了欧洲和中国过去长久分裂

的一个深层根基，也决定了以贸易和小政府为特点的英美体系战胜以军事、皇权和大政府为核心的大陆体系；中国能够形成超强的、统一的、具有持续性的大帝国，也是由作为媒介的表意文字对关系的调解方式促成的。

Livingstone (2009, p. 12) 整理归纳出中介三种核心意涵：扮演调和者的角色（调和对立的政治举动），扮演原本分立的各方并使其产生关系，将一种原本无以名状的关系以正式的方式直接表达之（2009, p. 12）。唐士哲由此分析指出，无论哪一种理解，中介都意指传播或沟通过程中引致任何主体与其他主体或者与环境产生关系的刻意举动（2013, p. 11）。综上所述，媒介不仅要人的思想和观念对象化出来，同时也居间以自己的方式调解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普遍的联系。

三、交往关系中的媒介内涵：动向性

交往的方式限定了媒介概念的使用场景。库蕾等学者就曾指出交流是一种现代概念，“交流”一词出现时是指“聚会的方式”，直到 20 世纪，“交流”才得到公认并被广泛应用（2005, p. 1）。库蕾将交流概念的兴起归因于大众传播方式的兴起。由此看来，大众传播的方式对应的媒介概念自然是报纸、广播和电视，但是人类交流活动远比上述媒介出现得要早，因此库蕾认为当时作为交往空间的古希腊的广场、圣殿、体育学校就成了交流的媒介（2005, p. 37）。大众传播方式也确定了媒体的概念，而媒体和媒介概念的混用也延续到数位传播场景。在新的交往场景下，社交媒体的概念延续了大众传播时期对媒介的语用习惯，因而理解媒介本质的第三条路径就是回到交往形式中去。

商贸交流是城市文明最早的交往形式之一，货币则是经贸交往的重要媒介。依据齐美尔的观点，经济交换的逻辑通过引导人们以市场规则为取向进行和平竞争，其实质是在减少竞争和斗争，进而使某种高水平的社会化成为可能。这样的交往场景就赋予货币媒介一个重要功能意义：货币的存在意味着现实生活中无数对抗的化解（秦明瑞，2005, p. 228）。货币表面上是在完成商品在人和人之间以价格形式的流通，但本质上是在实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解，并且使一切凝固的、质料的东西都难以扎根。因为货币的存在，一切事物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式中运动和流动。作为形式社会学的缔造者，齐美尔对社会关系的探讨并没有在货币媒介上浅尝辄止，而是延伸到 19 世纪出现的新兴大城市空间对社会关系的调解：城市是一个激动、异化的空间，

□ 符号与传媒 (22)

一个客观文化过度生长导致主观文化萎缩的空间；此间的人们对自己的基本状况是满意的，却没有意识到群体的不满（Hawthorn, 1976, p. 163）。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看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Marx）在精神交往的维度之外又增加了物质交往维度。马克思不认为人的本质是抽象的，因此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哲学家去探讨人性。马克思强调人是现实的人，人的自我感知来源于他的物质状况，他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塑造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齐美尔主张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而忽略其内容，马克思则更激进地将人的本质寓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之中。在具体解释人类交往活动时，马克思以生产关系串联整个社会结构和关系，正如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的，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2009, p. 724）。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互相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人们相互影响前，首先是对自然界产生影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实践和劳动建立起双重维度的关系，第一重是人与物质的交往关系，第二重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两重关系彼此影响。此时劳动就可以看作一个中介化的过程，劳动居间调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而交往方式（生产关系）的不同是受劳动中的生产力变量调解而形成的。马克思对此清晰地注解道：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

先后梳理齐美尔和马克思有关交往的理论视角，意在说明在不同的交往形式中，媒介不仅仅调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调解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到这里，似乎交往视角下对媒介的理解工作已经结束，可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开创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却颠覆了原有对“行动者”的认识框架，使人们在物质交往形式下得以纵深理解媒介。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体系紧紧围绕着人本的主体性和意识能动性，自然界则是人们实践和改造的客观对象。但在拉图尔看来，人和非人都可以是行动者，它们都被联结在密不可分的网络之中。在该网络中，人和非人任何一方的因素，都未被赋予特别的优先权，因而人们长久以来所谓的主体和客体实际上是虚弱无力的划分。拉图尔就此批驳人和非人的两分法基础根基：按照传统，一方面，我们宣称社会角色富有意识、言说、意志和意图；另一方面，又必须与服从因果决定论的事物区分开来。人因行动的自由而忽略了其自身也符合因果决定论，事物不配称之为社会角色是因为人将其行动定义为表现。（2004, pp. 73 - 74）可以看出，拉图尔以弥合人和非人的主客体界限来恢复物质等非人类的

能动性地位。

总结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得出有关媒介的两个论断。第一个论断：媒介作为非人类的实体，本身就是行动者，它媒合原本分立的各方并使其产生关系，就是一种行动。媒介通过触发某种社会关系参与我们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媒介具有动向性。同时，根据这一论断可知建筑之所以被称为媒介，不仅在于其象征层面，也在于它触发和调解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人一方面渴望定居，另一方面还是向往、追求游牧生活般的自由。建筑其实一直能动地调解安居与浮生的矛盾（阮昕，2014，p.6）。第二个论断：当媒介居间调解人和事物、事物和事物关系时，非人的事物同样具有能动性并创造出意义。中世纪的罗马都市昏昏欲睡，西克斯托斯五世则将散落在罗马的所有恢宏建筑用笔直宽阔的马路连接起来，这个冲动计划完成了一个理性不可达成的事——杂乱的建筑体觉醒并形成了一个伟大而有生命的城市（吉迪恩，2014，79）。

四、城市：媒介的三种内涵于一体

基特勒（Kittler，1996，pp.255-268）在论述城市即媒介时，将现代技术编织的传送信息的网络（如各类电子媒介与水、道路、电缆等基础设施），由河流、水渠和新闻频道构筑的网络，地图，山河、道路、各类系统与设施的交叉点，数据，地址及命令等视为媒介。他直言，这些渠道的交叉点即城市。基特勒指出了城市中能够作为媒介的一切虚拟和实体物质，以阐释城市中一切可以作为媒介而启动的连接。

在彼得斯（Peters）看来，媒介即存有。在他对于媒介的理解中，一切存有皆可理解为媒介，这些影响着文明秩序的各类器具在人类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最伟大的产物，成为影响人类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基特勒所言的各类渠道交叉点，还是各类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技术系统、时空媒介、权力与肉身……皆在城市中如洪流般汇聚，其丰富而模糊的符号意义将媒介内涵深植于城市网络之中。可以说，理解了城市，便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媒介。

（一）城市的对象化

结合先前对媒介的理解与基特勒对媒介的定义，城市作为媒介，首先是抽象之物——人类特性，具体化为城市这一事物。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

□ 符号与传媒 (22)

学派开启的城市研究，虽未给予“城市”一词一个清晰的概念解释，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他们认为，城市不是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其本身包含了人性的真正特征，城市中种族、文化、社会形态不断互动、重新生成，城市各种人类活动的交织成为城市设计的关键所在，各种新型人格在城市环境的培养中产生（帕克，伯吉斯，麦肯齐，2012，p. VII）。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从人文生态学视角出发，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同居民活动紧密相关，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具体而言，从三个视角进行理解。（1）城市组织视角：交通、通信等促使人口频繁流动又高度集中的一切，是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2）经济视角：劳动分工是城市经济组织的基础，个人与公众利益相互联系；（3）自然文化视角：城市是文明人类的栖息地，所有伟大文化都是在城市里产生的。基于此，帕克（Park）探讨了城市中的社会关系：涉及城市人际关系的秩序、道德、利益；涉及城市生活的社区、邻里、移民集聚区、隔离区、城市环境；涉及城市运转的城市规划、工业组织、社会控制手段。从媒介视角进行审视，不难发现：整个城市作为一种媒介，其规划、设计本身便传达着人类的行为信息；特别是邻里向社区的发展，改变了人与人的相处模式，社区使人际关系不再如基于情感的邻里般稳定，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到更广泛的范围，促使人们关心各种利益目标，人们的价值判断不断走向理性。

城市是人类的通泛表现形式，特别是空间分布特性决定着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如城市作为媒介将人的思想具体化为城市规划，在这个框架内，人规定了城市的边界以及各类建筑物的位置，并对这些建筑的性质与作用做出强制性的安排；由此逐渐形成了稳固的生活秩序、物质结构与道德秩序。以北京这一城市为例，元大都的兴建在规划中采取了“九经九纬”的设计理念，通过胡同的建设将城市规划为一个规整的空间，改变了先前游牧民族在广袤空间中生成的自由松散的生活秩序。原来盛行于游牧民族中的骑射等礼仪风俗在城市建筑与空间规划之中逐渐消弭，转而生成了一种稳固的生活秩序。芒福德接续帕克这一认知，并表现得更为激进，他在城市起源与发展的梳理中描述了人类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关系，认为城市实质是人类的化身，城市的每一个部分都携带着当地居民的特性、情感与传统，人在改造城市形式与功能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杰弗里·帕克在研究从古希腊城邦到现代城市时更为细致地指出，城市中的任何东西都要适应人的规模与需要，其既要容纳人类的文明，同时其结构和功能还要在任何事情上反映出来（2007，p. 4）。综合上述理解，城市将人类的生存、交往等特性对象化，并在此基础

上，将由此形成的人类诸多存在的关系——社会关系、权力关系、文化关系、资本关系等对象化。

当先驱们踏上陌生的土地时，他们率先做的事情便是建造城市。一方被他们选中的土地究竟具备何种特性，使其能够发展为城市呢？在选址上，城市一般都位于滨海或河口的位置，这可能是出于军事考量。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些地方一定是适合成为媒介的空间。它们或是在建立之初使人类能有避灾之地，以远离大自然与野兽带来的威胁；或是人们由于自然资源不够丰富，不得不通过贸易或战争等空间扩张的方式实现物品的自足，即城市将人的生存需求对象化，从而作为调解人与自然的媒介而存在；或是它们面向广阔的世界，以便与其他民族或文化接触与交流，即将人的交往特性对象化，通过调解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使城市获得文化上的辉煌。

（二）城市的调解性

媒介作为居间调解的手段，在德布雷关于媒介的理解中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呈现。德布雷所述关于媒介的第一重内涵中，媒介具备传播的特性，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信息在空间内可以完成瞬时的传递。追溯城市的起源可以发现，所有古希腊城邦都拥有广场、剧院、圣殿等会面、集会之所，成为信息与文化传播之地，它们既为每一位普通公民提供了咨询、解决私事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也为城邦的寡头政治提供了观察和参与的空间。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包含建筑空间在内的城市结构事实上作为调解权力阶层与普通民众关系的媒介而存在。由于无人在这些公共场所建立私人住宅，特别是作为公共集会活动的广场，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严格地分开，成为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地的一个分割带，划分与调解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关系。从第二重内涵即传承角度而言，媒介能够在时间的经久考验中，完成文化的传承。城市中的建筑在罗西的经久性概念中成为其考察城市时间特征的首要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形成了城市的文脉与城市的发展。在罗西看来，时间会侵蚀熟悉的特定环境与形象，而建筑却将“过去”带入“现在”，使“现在”也能体验到“过去”，一个城市通过它的建造来记忆，所以保存旧建筑就像保存人类头脑中的记忆一样；建筑由于凝聚了事件与情感而留下了形式印记，这些印记留下的过程即城市的历史，构成印记的这些连续的事件则成为城市的记忆。（2006，pp. 59 - 60）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城市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诸多建筑、空间实体因其功能、地位等的转变而改变甚至消失，从而其承载的记忆也发生断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城市建筑都

□ 符号与传媒 (22)

能够被长期留存而成为记忆的媒介。只有具备经久性的城市建筑体，人们在对其进行解释之时，才能够通过它的演变过程，看到使其发生变化的那些力量。城市记忆作为理解场所结构、城市生活甚至城市灵魂的向导，使得今人能够站在当下的时间点感知过去的历史事件与人类情感，使建筑成为调解实际关系的媒介。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早期的“城”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出现（张光直，1985，p. 62）。城市的建造首先是基于政治目的，城市结构本身可以被视为经过周密规划的政治行动（张光直，2017，p. 6），因而城市结构本身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肩负着传达权力中心思想与观念的使命，在其中生活、实践、沟通的城市人在与其长期不断地相遇、编织意义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对权力中心的崇拜与维护，进而使权力中心在更大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更为稳固的地位，继而反过来也巩固城市的社会结构。可见，包含建筑空间在内的城市结构，首先调解着统治者与臣民间的关系，随后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交往形态/结构，进一步而言，空间开始表征人类交往形态，调解着人类社会中的交往关系。就北京而言，北京的城址并非一直都在现今所在地，它曾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居民点，随后逐渐发展为北方的一座军事重镇，最后才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蓟城一直充当着调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媒介。公元前 221 年，秦朝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成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燕国的故都蓟城开始成为北方的一个军事要地，调解着封建时代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自秦至唐，每当内部壮大之时，总要途径蓟城这一经略东北的基地而扩张，而当内部力量衰微之时，蓟城便又成为东北部游牧民族内侵时的防守重镇。随着安定局面的稳固，蓟城又很快发展为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中叶之后，南方经济力量的崛起冲击了曾作为全国行政与经济中心的长安城，加之少数民族史无前例的连续入侵，至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蓟城（宋代称为燕京）开始由华北平原的门户成为全国最大的行政中心（侯仁之，邓辉，2011，pp. 45 - 46），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正式开始。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城市作为居间调解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关系的媒介，促成了一段民族融合的文明史。

（三）城市的动向性

媒介的居间调解是为了实现多方的交往。芦原义信（1985，pp. 7 - 9）在建筑学领域提出了积极外部空间和消极外部空间的二元分类。积极外部空

间能够充分促进人们的交往，因此在这样的空间中，每个局部都是充满人性关怀的；消极外部空间将重点放在外部秩序，向心式地建造内部空间，使人们缺乏展开对话的机会，但这种空间的构型有利于城市的规划。因此可知，空间的构型对人们的交往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最直接和简单的表现就是交往关系的强弱。

有学者指出，“场景”“空间”“有形地域”对人际交往及其认识有着特殊作用。墙壁、门和走廊、通道决定人们流动的方向，同时也决定着面对面的交往数量、类型和规模（殷晓蓉，2014，p. 21）。当户外空间质量提升时，人的自发性活动的频率就会提高，与此同时社会性活动的频率也会提高。城市广场利用地砖的质地与其他空间区隔开，召集人进入城市广场，同处一个空间，形成一定的密度，就为人与人的交往提供可能和条件。扬·盖尔总结道，确定大空间尺度最适宜的方法是使空间的边界与社会性视域的范围一致。鉴于要看清面部表情，人际交往的最大距离是20—25米，观看活动的最大距离是70—100米。（Gehl, 1992, p. 152）在人类的城市进程中，街道和广场都是城市中心和聚会场所，而随着功能主义的到来，街道和广场被公路、行人道和无际的草地取代。这种空间很难促成人们建立深入的交往关系。

城市的空间不仅调节了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也调节了人与物两个不同类型的主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路边咖啡厅面对着马路空间的座位更容易被选中，人宁愿等红灯也不愿意走天桥；前者是因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他人的视角，后者则因为人执着于依循平面空间省力的原则。空间的边际是由实物的区隔确立的，例如建筑立面、廊道、座椅和立柱等都可以确立空间的边际，也可以说空间的边际是介于物质实体和人之间的存在。人们在边际空间调节下和基础设施发生联系时，会在交往互动中获得安全感，这源于边际空间可以给予人视线后方的保护。

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在潜移默化地调节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人、活动、功能之间相距甚远是新城区的特征，以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交通系统使人们户外活动减少。人以身体作为媒介与周遭事物建立交往关系时，能捕捉到周围实体的细节；与之相对的是，近百年来出现的汽车每小时速度是人类步行速度的几十倍，因此乘车的人很难捕捉到实体的细节。现代社会往往是汽车服务的，所以与汽车配套的公共空间、标志物都需要忽略细节，要做得特别大。巨大的建筑、空荡的广场……标志物和人的关系通过汽车紧紧绑定，而细小的实体则受人视域的影响而被遗漏，无法建立互动关系。

因而，城市依靠自身的各种元素不断地在行动者之间建立交往关系，其

中的行动者是广泛的，既可是人，亦可是物质。城市就是一个行动者织就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开放性的，空间、建筑和城市的基础设施都在调节着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以及人和物质在城市媒介的调节之下完成磋商。

结语：从媒介到城市媒介

理解媒介的三条路径蕴含了媒介的三重内涵。(1) 考察媒介概念的起源可知媒介的对象化属性，即媒介将主体的抽象内容以具象化的形式剥离出来。“媒介是信道”可以有效定义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然而它对空间、语言、建筑、货币等媒介形式的解读是乏力的。媒介的对象化属性则可以提供足够有效的范畴去把握这些媒介形式。(2) 媒介毫无疑问具有中介特征。当人们借助“白色”概念理解“黑色”概念，借助方向“上”理解方向“下”的概念时，中介其实是在促成人类理解的可能；其中的“白色”和“上”都是在扮演“调解者”的角色，使主体对象化或剥离出来的观念得以理解。可以说，媒介的逻辑就是中介调解的方式和规则。(3) 媒介居间调解和联系的双方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具有能动性。媒介同被调解的角色均在行动者网络之中，并且媒介和其联系的行动者不断互动，使传播生成意义。

据此，本文提出城市传播视角下关于媒介内涵的理解：媒介是居间调解的行动主体，它将其他行动主体的抽象内容以具象化的形式对象化，并以调解的方式使其在行动主体间建立普遍的联系进而达成理解和交流的可能。其中，非媒介的行动主体可以是人类或非人类，主体的抽象内容则可以是思想观念、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形式则指可直接被行动主体俘获的感官经验，如声音和视觉形象。

梅罗维茨用三种隐喻来识别我们认识媒介的方式：媒介分别是“导管”“语言”和“环境”。第一种隐喻意味着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含了一定内容的、客观中立的容器。城市是人们汇聚的场所，因而城市空间承载了人类的交往活动，虽然它不一定是客观中立的，但城市仍不失为“导管”意义上的媒介。第二种隐喻“媒介是语言”意味着每种媒介与语言一样，都具有独特的结构性元素或语法。城市以空间为语言单位展开了人类社会最本初的叙述，即元叙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无不受空间这一语言结构的影响。第三种隐喻“媒介是环境”意味着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由特定类型的感性信息组成的。这种媒介环境通常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我们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塑造我们的体验。媒介使物成为中间之物，城市也如环境一样始终

包裹着人类，将人永恒地置于事物之中。

引用文献：

- 德布雷，雷吉斯（2013）. 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黑格尔（1996）. 小逻辑（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侯仁之，邓辉（2001）. 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 北京：中国书店.
- 盖尔，扬（1992）. 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基特勒（2012）. 城市，一种媒介. 文化研究，2，255 - 268.
- 吉迪恩，希格弗莱德（2014）. 时间·空间·建筑（王锦堂，孙全文，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库蕾（2005）. 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拉图尔，布鲁诺（2016）. 自然的政治（麦永雄，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 莱考夫，乔治；约翰逊，马克（2015）.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芦原义信（1985）. 外部空间设计（尹培桐，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罗西，阿尔多（2006）. 城市建筑学（黄士钧，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帕克，R. E.；伯吉斯，E. N.；麦肯齐，R. D.（2012）. 城市社会学（宋俊岭，郑也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帕克，杰弗里（2007）. 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 秦明瑞（2005）. 格奥尔格·齐美尔. 载于杨善华，谢立中（主编）. 西方社会学理论，228.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阮昕（2014）. 浮生·建筑——有关水平与垂直的猜想（上篇）. 建筑师，6，6 - 12.
- 唐士哲（2014）. 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 新闻学研究，121，1 - 39.
- 王鹏令（1981）. 论中介. 中国社会科学，2，151 - 166.
- 威廉斯，雷蒙德（2005）.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伊尼斯，哈罗德（2003）. 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殷晓蓉（2014）. 空间、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人际传播学的涉入和流变. 当代传播，3，21 - 23.
- 张光直（1985）.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文物，2，61 - 67.
- 张光直（2017）. 艺术、神话与祭祀（刘静，乌鲁木齐加甫，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 周翔，李稼（2017）. 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 国际新闻界，39（4），137 - 154.
- Hawthorn, G. (1976). *Enlightenment and Despair: 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转引自沃森，彼得(2018).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胡翠

□ 符号与传媒 (22)

娥,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Kittler, F. A. (1996). The City Is a Medium. *New Literary History*, 27, 4, 717 - 729.

Latour, B. & Porter, C. (2004).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Y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vingstone, S. (2009). On the Meditation of Everyth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 1, 1 - 19.

作者简介:

吴晓虹,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传播理论。

曾庆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新闻叙事、新闻话语、传播符号。

Author:

Wu Xiaohong, Ph. D. candidate from 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journalism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Email: wuxiaohong0723@163.com

Zeng Qingxiang, professor from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 mainly engages in research on news narrative, news discourse and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Email: 13683318729@163.com